

一体化:跨世纪的智慧工程

The Integration Is an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over the Century

李 怀 孙亚锋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大连 116025)

一、一体化:时代的要求

如果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也能反省一下自己的话,我们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为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而不胜自喜,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之中。另一方面,我们每年又把数千亿美元价值的巨额资源用来生产和制造同类相互残杀的武器弹药,导致“热战”“冷战”连绵不断。应当说,我们人类并不缺少才能,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足够我们延享几个世纪。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缺少的是智慧,那种使人类不断战胜自我从而和睦相处的智慧。我们没有理由埋怨潘朵拉何时打开了罪恶之盒,让丑恶充斥人间,而只需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重建睿智的世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人类今天终于找到了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模式与途径——一体化,这一跨世纪的智慧工程。然而,长期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至多从经济角度和策略的层面上来理解,缺乏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未能从社会工程与战略的高度推进一体化进程。今天,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认识。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应是如何系统地给出一体化概念的规定性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所作出的解释是:“在日常用语中,一体化被定义为把各个部分结为一个整体。”这种通俗性的解释显然有助于人们较简明、轻易地了解一体化的大体含义。但是,这种粗浅的规定性却无助于人们把握一体化的真正本质,不能把人们的思维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因而,这种认识所导致的结果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贝拉·巴拉萨接下来所做的解释中,一体化则完全被赋予一种经济学的涵义,被“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所代替。一体化的过程似乎是单纯的经济变量运动的结果及其形式的变化,没有看到政治和文化变量的作用及其结构的改变。在冷战

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全方位地给出一体化的新思维框架,而不再拘泥于“部分与整体”的传统机械论的经济变量分析模式。严格地说,即使我们单纯地考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和状态,也不能完全无视政治与文化的作用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上,任何经济一体化的进展都意味着传统政治与文化的相对“松动”。

应当指出,对一体化的经济学考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它确实揭示出一体化最初的经济动因,给出了理解问题的经济学视角,因而其指导意义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把一体化仅仅看作人类的一种经济行为,不懂得它本身所包涵的深层次内容及其深远意义,我们的认识就难免失之片面。不容否认,一体化发生的初始形态完全是基于经济利益冲动的需要,即使在欧共体和东盟这类政治色彩较浓厚的区域集团里,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联系,这类组织形式也难以维持下去。公允地说,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确实为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全方位地理解一体化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体化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民经济结合为一个范围更大的经济集团的状态或过程。”“经济的一体化(无论是地区的一体化还是全球的一体化)概念则指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实现的制度创新。”应当承认,上述见解在给定作为经济范畴的一体化概念的规定性中不乏真知灼见,较好地解释了传统的经济一体化定义,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一体化理论提供了借鉴。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把一体化单纯地作为经济范畴来理解,那已是过去冷战时期的往事了。就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其未来走向来看,一体化应当是和正在朝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发展,因而,我们所给出的应是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吻合的一体化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上给出一种特定的一体化新观念。

二、一体化新思维的具体内容

1. 一体化是基于对共同利益目标的追求和共

同问题的解决所进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全面合作形式,是人类理性的高扬和智慧的选择

人猿揖别,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那个时代虽说已有数百万年了,但是,人类真正高扬理性的类本质进行智慧的行为选择却是发生在从今天起始的将来。最为重要的标志大概要算冷战的结束和人类一体化工程的启动。如果说人猿揖别意味着人类在否定“它”类的同时肯定了自我,使自我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那么,一体化行为可谓是对动物野性本能的克服和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宏扬。二者同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把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体化的开端,似乎有点勉强。但这件事情本身却使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即人类的任何存在都预示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这也许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真谛所在。尽管由某些政治家们苦心积虑形成的局部特殊利益的理论曾风光一时,但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理性经济人”却把俯拾皆是的人类共同利益堆积成理论之山,使得“只有永恒的利益(即个别利益,笔者注),而没有永恒的朋友”的狭隘政治信条成为过去。不管怎么说,那种崇尚个别利益而无视人类共同利益的短视政治家们,早已在经济学家们所构筑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前黯然失色。在**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品生命周期学说**面前,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召唤**。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可以通过产品竞争与替代所带来的效率的增长得到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由功能互补得到说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则更是显而易见的。

共同利益构成一体化的基础。而共同的利益必然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人口、环境、粮食、能源、毒品等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非单个国家和地区所能解决。各国(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即使发生在个别国家或地区内的经济波动和政治转折,都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引发一种世界性动荡,抑或改变这个世界的既有图景。因此,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通过合作关系的建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获得更大的收益;要么在冲突和封闭中遭受更大的损失和走向停滞。按照对策论的思考,避免相互损害的唯一选择是世界各国(地区)携起手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大量的资料,我们估计,全球一体化每年可为我们人类节约6 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1万亿美元的消费支出。特别是科技成果的成倍增长及其民用化所带来的效益更是无法悉数计算的。

目前看来,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合作的唯一有效形式和途径就是一体化道路。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要追求共同的利益,解决共同的问题,就必然需要牺牲和舍弃某些个别的和暂时的利益。世界一体化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落后产业的利益,不惜对外构筑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阻止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势必影响共同利益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无法达到优化,同时也降低了该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对各国(地区)落后产业的保护应有一定的限度。对此,国际社会应形成一种共识,通过国际分工、资本转移、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等方式逐步推进一体化,最终使得各国(地区)利益能够在一体化进程中走向均衡。即真正做到互利互惠,增者与损者能够取得相互补偿,达到利益的某种均衡。就此来说,一体化是各个国家的利益由冲突趋向协调的结果。

2. 一体化也是国家(地区)乃至区域的主权让渡与重组的过程

本世纪以来令人瞩目的变化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理性的进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地区)权力已相对削弱,不足以形成对本国(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有效控制,国家(地区)权力已经成熟到了极点,并和开放程度呈负相关变化。与此同时,国家(地区)乃至区域的主权在国际化层面上的让渡与重组的过程早已开始。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国内政治国际化。国内政治上的任何波动都与国际形势紧密相联,都涉及特定的国际背景,因而一国的政治主权的实现绝不再是传统封闭意义上的“独立”与“完整”的原始涵义了,而是越发展具有国际色彩了。故而是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协作,构造各国认同的一体化工程来加以解决。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市场国际化态势,更使国家(地区)主权的传统涵义被不断削弱,弹性特征日益增大。正如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主任路易斯·埃默里杰所指出的,“国际市场已侵蚀了政治主权:国家越来越不能单独地对经济事务作出决断,并达到其目的。正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再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运用一样,一些传统的微观经济实践也变得更加难以持续下去。”可见,经济发展对国家(地区)疆界的超越势必引起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欧洲同盟向共同货币的迈进,就意味着更多的国家主权向同盟组织的让渡。

文化的平移与交流从更深的层面上把人类联结在一起,并使人类从传统文化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一扫昔日由专制和愚昧长期积淀和熏染而形成的狭隘、保守、嫉妒、自私、自大、独尊、争斗,苟且于既得权益而冥顽不化的陈腐劣习和思维习惯。把人类的境界与品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来。随着人类视野的扩展和理念的升华,以及不同文化的整合,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障碍与隔阂日趋减

少,交往日益深化,传统文化的分野将在人类文明的真、善、美旗帜下重新合拢,由文化所推动的国家权力的让渡与重组正在使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

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的推进,导致了国家(地区)权力的不断削弱,由此产生出另一个问题:究竟谁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个世界?显然,现有的一些国际机构不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际机构的权力组合形态中缺乏参加国(地区)主权的充分让渡,因而权力重组后所形成的新的权力形态在对国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中就缺乏硬约束机制,造成了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对国际事件负责的局面。可见,一个能够真正承担起国际社会管理与控制职能的组织机构对人类的未来将是多么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国际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确实已成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标志。

认真回顾一下人类历经的区域一体化的诸种进化形态(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政治同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一体化的过程实乃是参加国或地区主权的不断让渡与重组的过程。其中每向一体化的高级形态进化一步,都必然伴随着参与国或地区主权的更多让渡,以及由出让的权力重新组合成的超国家的新型国际组织机构权力的不断膨胀。由此看来,一体化的水平与程度直接取决于由各国或地区联合形成的国际组织机构权力含量的大小,而国际组织机构权力的含量又取决于参加国或地区的主权让渡程度。因此,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与程度最终取决于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地区,一体化水平就越高;越是落后的地区,一体化水平则越低。如欧洲和亚洲、非洲一体化程度的差异就很明显。

总之,一体化的过程是国际社会组织机构的权力对国家权力的不断替代过程。在这一权力弹性变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让渡的结果最初形成的往往是区域性国际组织,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深化,才会逐渐出现由国家权力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权力让渡形成的全球性的超级权力组织形式。

3. 一体化是共同的制度与规范创新的结果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当代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通过创新,企业不断扩张,从国家到区域再到世界,把国际间的交往内在地化为企业本身活动。我们是否可以借鉴熊彼特的这种观念,把各国政府视为国家这个“超级企业”的管理者?这样,各国政府的职能就是通过不断创新一体化的制度与行为规范,把一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纳入到国际一体化的行为轨道上来,从而为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实践证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活动的空间越大,有效信息获得

的就越多,从而不确定性就会越少,人类的自由度也因此不断增大。

严格地说,在各国主权既定的条件下不存在任何权力的“真空”,因而,各国通过共同制度与规范的创新所产生的一体化空间状态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制度空间。它的范围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各国政府通过权力的让渡所构造的共同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丰度。即这种共同制度和规范所覆盖的范围越广,所涉及的程度越深,超国家的制度空间也就越宽广,人类行为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从而人们所获得的净福利也就越多(从长期看)。

人类的共同制度与规范的设立必然会替代各国或地区内部的个别制度与规范,从而节省了交易费用。既然节约交易费用是人类的一种理智的追求,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积极实施一体化工程,以共同的制度和规范来替代个别的制度和规范,循此推进制度的文明。

制度化与规范化是一体化的重要标志。比较而言,一般民间的单纯双边贸易行为不能算作一体化范畴,至多可看作是一体化的准备阶段。一体化是由政府间的条约或契约形成并加以规范的。由各国政府共同组织而成的行使一体化职能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的创立是一体化发展高级阶段的标志。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是组织制度创新的结果。特别是世贸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形成了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约束力。所以,我们把一体化看作是各国政府的国际化行为不断趋向规范,并在制度上不断创新的过程和由此导致的结果。

4. 一体化将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差异与界限趋向模糊

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处处标榜的自我利益和传统个性相反,一体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对妨碍国际统一性的各种差异的消除,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从传统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走向经济、文化、政治壁垒的全方位模糊状态。这里所说的模糊状态是指由于各国之间的差异的减少和共性的增加所产生的趋向于“同一”的状态。

三、迈向文化的一体化

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曾是本世纪以来阻碍人类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障碍。现在,随着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壁垒已大大削弱,以往东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政治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各民族也开始逐步抛弃历史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民族主义的对立而逐渐走向融合。完全基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对立已渐成昨日黄花,传统的界限在人们的心中日益模糊起

来,为刚刚跨出冷战时代的人类创造了走向一体化的良好开端。

一体化行为的原始动因恐怕只能由经济学给予合理的解释。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的发生原因时,以及地区主义和国际一体化的行为动因时却经常陷入矛盾之中。似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一种经济利益的对立之中,因而他们的行为选择就必然处于对抗中。一边鼓吹贸易自由,另一边必然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一边积极倡导全球一体化,另一边就搞起地区主义。这种观念自19世纪40年代由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以后就一直统治着经济学理论界。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不仅一般商品,而且生产要素、科学技术、资本的流动日趋国际化,建立在生产要素不具有国际流动性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就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国家(地区)之间的事了,而是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地区)间也搭起了新的一体化框架。无论是欧盟的扩展,还是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甚至亚太经合组织所设计的未来远景中都显示出这种新迹象的存在。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蒙德·弗农等人所作出的解释还是可信的。弗农把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几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上,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创新产品阶段,作为创新国的美国等最发达的国家有着比较优势。但创新国考虑到产品的销路和降低成本等因素,必然会到其他能够接受该产品价格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生产,使得技术得以普及,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出来,成为成熟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产品的扩散,新技术逐渐变得更易于掌握,该产品的生产必然会流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标准化产品,直至发展中国家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今天,先进的高科技产品处于创新产品阶段,纺织品、皮革和橡胶制品处于标准化产品阶段,汽车似乎处于成熟产品阶段。因此,在国际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竞争所导致的受损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从长期来看,所有的参与

国都将成为受益国。传统理论所设置的此消彼长的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界限已经变得日益模糊,并逐渐为彼此共生的共同利益所代替。

应当说一体化的真正伟力根植于人类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由一种文化的文明积淀成的精粹越多,品位越高,传播得越广,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就越易于交往,人们心目中的界限(如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就越发模糊,从而对一体化的认同感也就越发强烈。反之,狭隘与极端的文化观念必然造成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敌视、对峙、猜疑和战争状态。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发生确实需要我们人类从文化的层面上反思过去,反省自我,不断创新文化理念。因此,一体化被我们理解为一种人类文化品位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界限走向模糊的状态。

综上所述,一体化是人类理性的选择。回首往事,我们人类常为自己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成就沾沾自喜。遗憾的是,我们在社会工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寥若晨星,至今尚无一例人类整体合作的大型社会工程项目可以引以自豪。由2000年文明史积淀而成的智慧应该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是一体化新思维的面世,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体化社会工程,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让社会选择我们,还是让我们选择这个社会?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难道不需扪心自问吗?

世界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不仅需要专门家的“匠”级思考,同样也更需要“大师”级的深思。本文的写作就是为了引起环球大师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期减少齟齬与摩擦,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参考文献

- [1]周茂荣,论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世界经济,1995.6
 - [2]罗肇鸿,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与制度创新,世界经济,1995.10
 - [3]路易斯·埃默里杰,全球化、地区化与世界贸易,世界经济译丛,1993.3
 - [4]张二震,略论经济一体化发展新趋向,国际贸易问题,1995.5
-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64页)

技术开发组织”(NEDO),由NEDO与应用能源研究所(IAE)签订合同,在东京和札幌分别筹建一个中心和一个实验室。NEDO兼管与国外研究单位的合作,IAE则出面协调私人企业界的资助和10余所大学的相关基础研究。4年来,在这一系列研究发展活动中最大的进展就是建立了这个900m²的新氢能实验室,在这里我们几乎看到了所有的实验装置,从弗莱希曼和庞斯(Fleischmann & Pons)的开放式电解池量热器到库尼马兹(Kunimatsu)的封闭式燃料电池电极的电解池量热器;

从核反应产物(中子, Gamma, 氚, 氦-4, X射线, 带电粒子等)到充氘过程的研究;从金相分析到X衍射的在线分析,乃至核磁共振分析H/D比。除了这次会议上新公开的“核嬗变”现象和中国的气态充氘研究外,新氢能实验室几乎包揽了每一个重要方面的研究。

国家科委基础处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直支持国内的“常温核聚变”研究,并希望我们能独辟蹊径,将“常温核聚变”的研究深入下去。

(责任编辑 刘先曙)